

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体系初探

◇ 杨光斌

新时代新挑战与新思想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虽然不像毛泽东建立新中国和邓小平改革开放那样具有明显的质变,但中国靠其规模而发展起来后引起的量变其实具有质变的性质。中国的规模太大,这一规模本身已经有了质变的意义,不但带来了世界秩序的变化,也对国内秩序带来根本性变化和挑战。

世界秩序的变化。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衰落之中。这意味着,主导世界秩序的权力正在位移,世界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话语权空前扩大,而且必将更加具有主导性。

国内的结构变化。在政治建设上,到2022年左右,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定型,治国理政的方法方式也将更加制度化、法治化。在经济建设上,几十年高速增长之后所呈现的“新常态”正在催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且整体性成功升级的可能性很大,中国的发展模式随之而来将呈现“发达型”。在民生建设上,到2020年,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了更实际的意义。所有这些,都有了“新时代”的意义,需要新的发展理念,新中国前60年的理论和思想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

新的挑战。新时代的新挑战是多方面的,也十分严峻,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政治经济关系上。市场经济已经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人的观念的深刻变化和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这些变化在过去已经对执政党构成过严峻挑战,诸如各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但是,市场经济带来利益多元化而产生出利益集团,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顽症,顺其自然就必然是政治上的多元化即多党制,正如大

多数国家所实行的政体那样。如果这种情况在中国出现,必将是灾难性后果。这样,如何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多元化与我国宪法条件下的民主集中制即党的领导,将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个不容轻视的长远性、根本性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长期性的根本性挑战,加之世界秩序的大变局以及国内走上新阶段,都迫切需要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因应新时代的习近平思想。

从文明基因出发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是人们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命运、对于人的存在价值的哲学思考。为此,历史哲学观的形成,既需要对大历史的关怀和理解,更需要一种大的政治情怀。为建设政治而理解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政治智慧,从文明基因中寻找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习近平历史哲学的一条主线。

在2017年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从文明基因讲到文化自信问题。可以说,“文明基因”意义上的历史连续性,是贯穿习近平历史哲学的经纬,习近平总书记也是新中国以来最重视文化传统和文明基因的领导人。新中国前30年主要是在破旧立新,因此对传统文化主要是“破”的立场;改革开放后30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模棱两可,领导人说不清因而也很少讲。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则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传统文化和文明基因之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

习近平的中国观不仅把改革前后两个30年统一起来,还把当下中国视为5000年历史、170年历史的一个连续体。这样的历史观决定了,习近平特别重视历史传统所提供的思想资源,重视儒学的背后

16 | 2018 | 1 | 河南社科文摘

应该是寻求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在2013年11月视察曲阜孔子研究院时,习近平就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要求“四个讲清楚”。第一个讲清楚厘清了文明基因与制度形式的关系,即那些没有文明基因的“飞来峰”制度必然行不通,而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则是基于自己的文明传统。第二个讲清楚是弘扬民族精神问题,第三个讲清楚是文明多样性问题,不存在“普世价值”代替其他文明体系。第四个讲清楚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基于民本主义的文明沃土之上,社会主义和民本主义是可以通约的。没有历史哲学的关怀,是不可能提出这些最基本的、也是不容易讲清楚因而也是容易被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不仅基于对中华文明和当代中国政治的理解,也离不开比较文明的视野。

从文明基因出发的历史哲学是一种新历史唯物主义。相比传统的侧重于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新历史唯物主义在强调经济基础作用的同时,更多地主张历史文化传统的作用,是一种更加宏大的历史观。

政治制度“乃至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新政治经济学

历史哲学所展现的大历史,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乃至军事权力复杂互动的历史,其中代表国家权力的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作为结果的政治权力一旦形成,往往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对人类的制度变迁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塑造着经济生态、文化生态。

从人类大历史到新中国历史,都昭示了一个重要道理,那就是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乃至在关键时刻的决定性作用。为此,我们需要反思流行的庸俗的历史唯物主义,并需要重新认识流行的西方经济学原理,建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固然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思想,但绝不是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能解释的。强调产权、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视或者忽视300年来世界经济史的一般规律,那就是后发国家成功的国家之道在于政治制度的关键作用。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经济

史提出的课题是,关于企业的性质、市场的性质、政府—市场关系即政治经济学、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即经济社会学,都需要重新认识并建构,从而建构起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目前,中国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上,在这个方向上基于中国的伟大实践的理论总结,已经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基础。

理解了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原理,就应该明白,现在流行的所谓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说法,经不起历史哲学的考验。显然,不能改的就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也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表达对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新看法,也就是说,不同意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的流行说法。如果放在世界大历史的视野下去看“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就更能明白这一命题的历史哲学意涵。

因此,政治制度“乃至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命题,意味着人类需要重新研究和认识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和性质。这一命题不但指出了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向,也是治国理政的基本逻辑,蕴含着重大的历史哲学原理。

以国家治理理论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理论

和任何国家的国家治理一样,国家治理首先是一套价值体系,其次是一套治理体系,然后是实践价值体系的公共政策。然而,具有理念的公共政策能否得到执行和落实,关键看国家治理能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别,并不取决于制度形式,而是治理能力。治理能力贯穿在价值体系—治理体系—公共政策之中,因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或者说是国家治理理论之魂。

中国的价值体系无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套价值体系不是空洞的,在实践中通过一套历史哲学和治国理政的新政治经济学而展现出来。换句话说,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哲学思想和新政治经济学思想都指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治理体系即制度体系,则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全方位的结构上的优化升级。在政策逻辑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升级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之后提出的“法治中国”则是建设现

河南社科文摘·2018 | 17

政治 | ZHENGZHI

代化的治理体系的出发点,“四个全面”是建设治理体系的抓手和战略布局。

比较历史可以看出,建立现代性的治理体系容易,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难,因此中国的重点是建设以治理能力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好的治理体系转化为治理能力,必然有一个中介机制。没有中介机制,再宏大的、理想的制度结构都只能陷于空转而不起作用。在中国,这个中介机制就是我们常说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制度正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所在,这是国际比较的结论。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上,“改革60条”事实上就是围绕划定权力边界和制约权力而展开,在此不必赘述。在国家能力建设上,在中国,国家能力说到底就是执政党的领导能力和建设能力,而保证这种能力的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它是贯穿于所有政治层面和权力关系中的“制度之魂”。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才说“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这是关于中国政治性质的新定位。在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能力的实现首先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没有部门利益的决策机关,其次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合理作用。

以公正社会为导向的新发展理念和世界秩序观

在着力解决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时,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这既是对改革方向的定位,也是对发展经验的总结。

只有社会的公正才有社会的和谐,这是柏拉图早就给我们的智慧。鉴于“维稳政治”的教训,当下的治国理政指导原则事实上已经是以公正为导向了,公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追求。“公正”是习近平多次讲话的一条主线,而且既在最低要求上谈公正,也在最高目标意义上追求公正,“坚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公正的核心是什么?习近平在很多场所、很多层面都讲到公正,但主题则是“制度公正”,强调通过制度安排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制度正义中,其中公正的司法制度最为重要,是因为公正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以制度正义为指导原则,抓

住了正义的核心。正义有很多层面的意义,但核心则是制度正义问题。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是讲制度正义,即正义的主题是制度。很多已有的改革体现了作为“公平的公正”思想。这些以公正社会为导向的改革,反过来又上升为新的发展理念。十八届五中全会总结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落脚点在“共享”上,这是建设公正社会的发展理念。

世界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以公正的国际社会为导向的世界秩序观,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已经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之中,它是对现行世界秩序的一种“中国方案”。

历史地位与贡献

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新政治经济学认识论的视野之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主要在于国家治理能力;而指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或者目标则是国内的公正社会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秩序。习近平思想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在2016年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四个自信”的同时又提出了第四个自信即“文化自信”,这是其历史哲学思想的一种自然延伸。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代代相传于,内化于生活在固定疆域内的华夏民族血脉中,因而构成了绵延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共同体,从而可以称中国为“中华文明基体”,即由文明基因而构成的一个共同体。中华文明传承5000年而不曾中断,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

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不但是经济的,更多的还有历史文明基因和政治制度,这是“新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为“新”的所在。新历史唯物主义堪称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伟大实践而发展起来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二)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思想是基于中国经验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

国家权力是“互动的制度化网络”,即经济权力、

18 | 2018 | 1 | 河南社科文摘

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互动,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互动的结果,并总是代表着国家权力。

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象征着国家权力,政治权力的变化更直接触动国家权力或动摇国家的根本制度,因而政治权力更具有根本性。国家的命运系于制度,尤其是根本制度。这就意味着,对政治权力的变革必然是渐进的,而且是固本性的,完全不同于经济变革的创造性破坏。政治权力结构的破坏,带来的可能不是新结构的均衡,而是新的动荡甚至是灭顶之灾。两百年来,美国经历了很多次危机乃至多次的政治危机,但美国总是以固本的、渐进的方式改革其宪政结构带来的问题,甚至以经济方式来掩饰其宪政结构问题。英国也是如此,即渐进地进行选举权改革,固化其宪政结构。相反,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极力“揭盖子”,两年之内搞垮了苏共和苏联。

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诫我们,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决定性的建设性作用或决定性的破坏性作用。到底以哪种形式表现出来,说到底要看政治制度是否符合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明基因,是否符合现实的社会结构。实行了西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出现无效民主和无效治理,说到底就是企图以“飞来峰”解决自己的问题,结果则是南辕北辙。

(三)以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理论,变化了发展理论

“二战”之后,西方国家首先提出了发展理论,其核心就是按照西方模式而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所谓的“好制度”“好政策”。然而,70年过去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如何呢?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不仅如此,北方国家的发展依然出了大问题,诸如意大利、希腊、

政治 | ZHENGZHI

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出现了“逆发展”,成为国家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对象国。在这种浪潮中,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依靠自己的制度优势,主要是制度所体现的治理能力的优势,一举成为全球化的领头羊。

中国的经验无疑应该提升为新发展理论,更化旧的发展理论,那就是我们讲的以发展能力或者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四)以“公正社会”为导向的发展理念,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守和丰富

任何国家都有一套立国的基本价值,否则再强大的国家也是脆弱的。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必然,甚至首先应该包括一套价值原则。也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所推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但有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还有社会主义的价值属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由12个词、24个字构成,涉及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价值观。其中,我们认为“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最低也是最高价值,应该是价值体系中的内核,即所有其他价值观都是围绕“公正”而展开,以“公正”为取向。

从第三波民主化到“阿拉伯之春”,意味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泛滥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落。然而,中国的伟大复兴及其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不但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守,也是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以信心。相应地,“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得世界秩序有了更多的社会主义色彩。

作者简介:杨光斌,河南桐柏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摘自《学海》2017年第4期,原文约11000字)